

制度不麻木，维权才不会比创意

社会热点

□ 志灵

近日,农民模拟外交部发言人讨薪视频策划者奇姓男子现身,在被媒体记者问到“能够帮他们讨薪成功吗”时,他表示,“这事儿说起来挺悲哀的。黑锦和手里拿着判决书呢,那是什么?那是国家的法律啊,但是一直没有生效,你让这些怎么办?这些人好多次都说想采取极端手段,但是这样的事社会上太多了,社会都麻

木了。我做这行久了,点子真的越来越不好想,这是挺无奈的一件事”。

讨薪视频火了,意味着事情本身受到了关注,相信讨薪一定会按照这类事情的传统模式取得圆满成功,即网络创意引起关注,传统媒体跟进报道,事件成为关注焦点,引起领导和相关部门重视,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虽然仅就事情本身而言,这可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对于维权的当事人来说,越是这样,反倒越证明维权的尴尬与无奈。

讨薪视频的走红没有一点预期性可言,就像早已存在的“元芳体”莫名其妙地走红起来。你若要问元芳怎么看此事,他一定会说:“这其中一定

有蹊跷。”你想,网络中那么多人发帖,凭什么你的帖子就能受到普遍关注?农民工讨薪的事情这么多,前些年爬个高塔、堵个道路就能引起关注,可如今你要没点有吸引力的噱头谁会关注?

不少人总是在说,网络技术的发达降低了表达的门槛,使得一件很小的事情都可能上升为影响力很大的公共事件。我不敢否定这种观点的正确性,但问题是,一切皆有可能有时候意味着一切皆无可能。网络表达或者网络维权固然有门槛低、效率高的优点,但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这样的优点使得个体的表达很有可能变成无效的表达,因为表达太容易了,但受关注的点还总

是有限的那么多,自然成功的概率要下降。

这种情况下,网络维权若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有创意。仅有农民工讨薪还不行,因为这太稀松平常了,还必须附加足够的创意来吸引关注。可是,当创意的水平普遍提高时,要想在浩如烟海的网络中脱颖而出,就得有更具吸引力的创意。当然,很多时候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成分。这也就是奇先生为什么要感慨,“点子真的越来越不好想,这是挺无奈的一件事”。

近年来,有效维权的途径一变再变,先是“信访不信法”,然后发展到现在的“信访不如上网”。表面上看,这是维权渠道的拓展,可实际上是维

权空间愈发狭窄的征兆。法律具有普遍性和低成本性,不需要当事人有任何创意就能维权;而信访虽然不那么“法治化”,但至少它也是一个制度化的途径,有规则可言,只是在实践中被弄得走样而已。可上网呢?维权的诉求能不能成为关注的焦点,几乎要靠拼创意、撞大运。

当正常的维权变成不正常的“彩票中奖”,那些靠创意比拼维权的成功者,更像是靠无数个注定中不了奖的人“资助”起来的幸运中奖者。一将功成万骨枯,成功者有多幸运,其他人的维权就有多尴尬。所以说,真正有效的维权,绝对不应该是让正常的制度途径变得麻木,而变成创意的比拼。

画中有话

□ 文/范子军 图/赵乃育

10月22日,一则《5号线地铁惊现刺猬防挤包》的帖子登上北苑社区网的首页,网友“恨琉璃”在帖中声称,在5号线乘车时,发现一人背着的硕大背包上布满红色倒刺,“一根根惊悚吓人,站他后面的人根本不敢靠近”。北京地铁客服表示,此类背包尚未列入地铁禁止携带的物品目录。

不能不叹服商家有才,从地铁拥挤、小偷防不胜防中嗅出商机,发明了这种“刺猬防挤包”,而且从网店反馈的信息来看,还蛮有市场潜力。这种镶嵌了数厘米尖锐铆钉的“刺猬包”,不仅让同车乘客“敬而远之”,有关方面

也已经注意到潜在隐患,限制甚至列为违禁品或许是迟早的事。

毋庸置疑,“刺猬包”的应运而生,有其特定的社会土壤,一些人看好并且背着乘地铁,或是出于无奈,不过想使自己免受拥挤和偷窃困扰。当然,背“刺猬包”乘地铁,置可能给其他乘客带来的不便与安全威胁于不顾,显然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不仅自私,而且不道德。

“刺猬包”热销,旁若无人地背上地铁,表面是为防挤防盗,实质上暴露出与社会沟通素质和技巧的匮乏,是心理不健康、不阳光的真实体现。面对现实问题和矛盾,不是由己及人、换位思考,以谦卑、友善的心态,去寻求融合、协调、和谐,而是采取排斥、抵制、抗拒的态度,碰不得、惹不起,人为地制造距离感,以图自

“刺猬”出动



个儿的苟且偷安。

布满铆钉的“刺猬包”固然让人惊悚,但这种缺失包容、让渡、分担的胸襟,拒绝沟通、友爱、互助的“刺猬心态”更叫人忧

心,被放大的“世态炎凉”,不但加大人与人之间的心理隔膜,而且与社会文明背道而驰。因此,要拒绝“刺猬包”,更要提防和消除“刺猬心态”。

言者有意

莫把“惶恐”当成“矫情”

□ 木须虫

近日,一份调查引发网友关注,调查内容为“月薪多少会让你在相应的城市生活不惶恐”。数据显示,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需9000元左右,而成都、大连等二线城市则在5000元上下浮动。

用收入的数值来考量生活的心理状态,从逻辑上讲的确不怎么靠谱,但是类似的话题总是一次次地在网络上流传,总是会引来大量网友的围观,虽然变化的只有收入的数字,以及“惶恐”、“幸福”之类的字眼,但是拷问的终究还是公众在当今环境下生活的一种体验。

综观网友吐槽,可以看到惊人的一致,不管收入高低,都表现出“手头紧”等惶恐心态,担心养老、抚幼、医病、购房等可以预见的生活高成本带来的压力。这其中尽管包含有不同区域、不同消费层次的支出状况,但是并没有多少选择性消费成分。所以,所谓的月薪惶恐标准,大抵表达的是生活成本高、收入增长滞后的整体忧虑,也反映出公众普遍的压力与压抑。

事实上,收入与生活成本是相对的,潜藏在背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一是收入在国民财富中所占的地位,当20%的群体占有80%的社会财富,另外的80%难免会有生存不安的焦灼之感;二是社会保障构筑起的基本生存供给,能否起到平抑的作用,然而,“生不起、死不起、娶不起、病不起、老不起”,是不少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如此环境下,工薪阶层仅靠那点死板的收入,说实话无论额度多大,都缺少了“保险系数”,不确定性的存在又难免会有朝不保夕的痛楚之感。

月薪里的惶恐知多少,之于个人只是生活的呻吟,不排除极个别有矫情的成分,但是这样的声音多了,其实就成了群体的反响。心理的焦虑,需要的不止是工资增长来抚慰,更需要从社会管理层面上,有效地调整国民财富分配方式,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发展成果的普惠与共享,纾解压力带来的惶恐与不安。

关爱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 桂子

近日,央视推出年度大型新闻公益行动——“2012我的父亲母亲”,记者分赴全国各地采访老人,关注老年人的生活和想法。记者在北京采访一位老人时,问现在最在乎什么?那位看起来很硬朗的80岁老奶奶称,年龄大了,不希望活着。记者问原因,老人说,现在的孩子不像从前的孩子,从他们身上感觉不到温暖。

听到老人说出这样的话的确让人心酸。前几天一则新闻似乎为这句话提供了现实的例证:青岛市民

张先生与弟弟妹妹去爷爷家吃晚饭,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话,但孩子们不是拿手机玩游戏就是刷微博。老人受到冷落,说了一句“你们就和手机过吧”,一怒之下离席。网友评论说,原来“世界上最远的距离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

其实,每年重阳节之际,我们都会看到类似的新闻,也会发出同样的呼吁:多回家看看,多陪陪爸妈。可我们依旧是忙、忙、忙,父母的孤独一如既往。《重庆晨报》发起的关于“这个重阳节,你会回家看望父母吗?”的调查发现,这么一个简单的

问题,却让众多网友纠结。仅两成人确定要陪父母过节,更多的人选“多赚钱改善父母生活”,可对父母来说,儿女最好的礼物就是“常回家看看”。

为人子女的我们,已经习惯了父母无私的爱,却常常因工作忙碌、生活奔波而忽略了对老人的关爱。世界上最悲哀的事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有多少人想要对父母尽孝时,却只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和愧疚。

对老人来说,最害怕的就是晚年生活的孤独。正是孤独,让许多老人“感觉不到温暖”。“尊老敬老”一

直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但“尊老敬老”并不仅仅是给父母提供优裕的物质生活,还要常回家看看,从精神层面给老人以温暖。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帮助和关爱老人,是整个社会亟须改善的,比如,能否让老人购物有优先专柜,老人看病可以优先挂号,老人投诉优先解决,老人乘车可优先上车……“想老人之所想,尽老人之便利”,“尊老”该从这些点滴做起。

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禁止未成年人整容需强化责任追究

□ 傅达林

近日公布的《广州市未成年人保护规定(草案)》,规定医院及整形机构在未征得监护人同意下,禁止为未成年人进行非医学整形手术,这一条款吸引了不少网民的注意。

由于我国整容行业尚不规范,一些技术尚不成熟,未成年人尚处心智发育阶段,盲目整容很可能造成身体上的重大伤害,甚至影响到青少年价值观的形成。广州禁止未成年人私自整容,体现出了立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良好追求。

广州立法对出于医学理由及一些在早期施行更有助于恢复的整形美容手术未予禁止,同时设置监护人同意程序,既确保需要整形的未成年人在更慎重的程序下进行,又对其他整形进行全面禁止。未成年人在法律上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他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须由法定代理人代理或同意。整形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手术,未成年人显然不具备自我决定的行为能力。因此立法在区分医疗和有助于恢复的整形美容手术情况下进行必要的限

制和约束,充分体现出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严密性。

不过就执法可操作性而言,立法规则尚需作进一步完善。暂且不论生活中各种鱼龙混杂的美容机构,单从责任设定上看,若要避免非法整容给未成年人带来伤害,立法就不能忽略相关法律责任的明晰。例如,违法对未成年人实施整容的机构,应当受到什么处罚?未征得监护人同意的整形又应承担什么法律后果?在一些整形机构明目张胆地把未成年人当成敛财对象的社会环境中,上述法律责任的

制度设计,无疑对执法具有更关键的意义。

当然,对责任的设定并非这一部草案所能负载,还更多的涉及到其他衔接性法律的对接。我国台湾地区规定,帮助未满18岁青少年文身或穿洞将触犯民法,可要求赔偿并负责激光祛除文身的费用。触犯刑法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根据违法性质和后果区分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在不同立法中形成合力,并建立起配套的执法监督和权利救济机制,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题中应有之义。